

从畅通社情民意渠道的视角看意识形态安全

方世南^{*}

〔摘要〕 社情民意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与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着紧密联系。畅通社情民意渠道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从而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之举。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正视社情民意渠道不够顺畅的一系列重大而突出问题,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责任意识 and 使命意识主动化解因利益诉求差异和执政能力有待提高而引发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多管齐下的力度夯实畅通社情民意渠道的坚实根基,努力形成在价值认同基础上达致价值共识这个最大的社会公约数,以党民关系和谐推动政治文明发展。

〔关键词〕 唯物史观;社情民意;意识形态安全;政治文明

社情民意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对社会现实反映而形成的一种社会舆情和意见愿望,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与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着紧密联系。意识形态工作是执政党保持和强化自身主流文化价值观从而使其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落实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而畅通社情民意渠道则是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在双向沟通中增强互信、获得能量交换以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并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只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正视当前社情民意渠道不够畅通的一系列重大而突出问题,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主动化解因利益诉求差异和执政能力有待提高而引发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多管齐下的力度夯实社情民意渠道畅通的坚实根基,努力形成在价值认同基础上达致价值共识这个最大的社会公约数,才能奏响主旋律,集聚正能量,以党民关系和谐推动政治文明发展,构建起社会和谐稳定以及意识形态安全的铜墙铁壁。

一、畅通社情民意渠道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之举

社情民意与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着紧密联系,从学理性和规律性的高度把握两者联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215123。本文是2015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个全面’和‘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研究”(2015YZD10)阶段性成果。

系,有助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和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ideology)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概念。追溯其源头,意识形态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汇“理念”(edios)和“逻各斯”(logos)两个词的组合,其意是“观念学说”(doctrine of ideas)也称为“观念科学”(science of ideas)。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首创者是被马克思称为“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自1801年到1815年,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也译为《意识形态要素》)四卷本相继问世。特拉西认为,对于人类认识活动和认识史的研究,应该注重感觉经验,运用对事物的精密观察的实证研究方法,从事物发生的过程性出发认识对象,通过直接的感觉经验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因此,他拒绝传统哲学中用本体论统一一切的知识论和方法论,而试图依据洛克的《人类悟性探讨》中的经验论和孔狄亚克继承洛克的认识论而形成的《人类知识起源论》《体系论》《感觉论》,构建一种始于感觉的研究观念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学说,从而将全部科学都建立在这种观念科学的基础之上,特拉西将其称之为“意识形态”。特拉西的用意是,通过对思想的起源和事物本质进行理性的分析,将神学和形而上学驱除出科学的地盘,使认识论和观念体系走向科学和理性。拿破仑执政时期,在特拉西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共和的“意识形态家”(idéologues)团体,主张依靠理性而不是暴力去解决社会重建问题。拿破仑对此嗤之以鼻,他嘲笑特拉西这些人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家,并从贬斥性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将意识形态说成是一种“虚假意识”和乌托邦,所谓意识形态家,也被用来指称如同特拉西这些仅仅局限于观念领域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家”。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唯物史观的高度,通过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的先知们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中科学地阐述了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了这个概念的贬义,批判了当时德国流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意识形态观,称其为“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①。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虚假意识”以及虚假性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特征。这种虚假性在于当时德国流行的那些以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为代表以及剥削阶级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包装为全民利益和全民意识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颠倒了意识与现实、经济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关系,不是从物质资料的生产、经济生活的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甚至以观念取代现实,是一种颠倒了的 worldview 和方法论。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视野里,历史被歪曲为仅仅是思想观念史,而物质生活过程这个作为思想观念之基础的却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得出了思想或观念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的唯心史观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②但是在其掌权以后,马上将反映自己阶级统治和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意识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价值中立的“意识形态”。这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用普遍性的口号掩盖其阶级利益实质的虚假的观念。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统治阶级倡导的所谓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和将现实关系伪装起来的精神观念力量,是对客观真实的社会现实的颠倒而虚假的反映。其本质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企图达到长久统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或者说所谓的“虚假意识”,也就是意识形态的“颠倒性”重新颠倒过来,使意识形态成为真实地反映社会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现实关系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见愿望的思想观念,才能发挥意识形态在改变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思维的积极功能。

由此可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看,只有那些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关系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见愿望的意识形态,才是真实的观念上层建筑,才能发挥对经济基础的能动的反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工作实质上是一项争取民心、体察民情、顺应民意、凝聚民力的工作,高度关注和重视社情民意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和重心,所谓“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或“民意是最大的政治”等说法,就是将意识形态工作以及确保意识形态安全与社情民意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表述。在当代中国形形色色和错综复杂的所有关系中,党与人民的关系是最为重要、最为根本和最为关键的核心关系,由这个核心关系影响和制约着其他多样性的关系,而决定社会和谐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最为根本之举是党民关系的和谐。只有社情民意渠道畅通了,才能构建和谐的党民关系,这是从根本上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举措和重要内容。我党反复强调的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必须站稳群众立场,必须高度重视社情民意,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的唯物史观,是执政党赢得立身之本、夯实执政之基和获取力量之源的必然要求。

社情民意与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突出地聚焦于民心上。社情民意究其本质可简称为民心,意识形态作为思想和观念上层建筑,尽管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但集中到最关键的一点上,就是民心,因为所有的社情民意,本质上都是民心的反映。能否重视和顺应社情民意,直接关系到执政能力。从反映“兴亡周期”的中国历史经验以及总结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深刻教训来看,人之命系于元气,国之命系于民心。得民心者必得天下,失民心则必失天下。民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社情民意反映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愿望,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期盼和要求,也展示出人民群众中间隐藏着的丰富经验和智慧。畅通社情民意,让党和政府能够直接倾听到人民群众的心声,就在党群之间、府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双向交流沟通和心灵感应的连心桥,从而有助于防止目前存在着的如同“塔西佗陷阱”般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2014年3月,习近平到河南省兰考县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引用“塔西佗陷阱”时说:“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①

因此,只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采取切实举措让社情民意渠道宽畅起来,使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愿望,将党的意志和人民群众的意愿一致起来,才能使我党因有牢固的群众基础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从而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姿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信赖,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社情民意究其本质是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体现。运用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有助于洞悉在纷繁多样的社情民意背后,其实都隐含着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说到底,决定民心向背以及支配着人民群众意见愿望和选择的最为根本的东西在于利益这个根本诉求。唯物史观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每个既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关系。正确理解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鲍威尔把思想和革命激情看成历史活动的决定性因素的唯心主义错误时说

^①《习近平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9月8日《新华网》。

道：“‘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①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没有自身的利益，或称为特权。所要谋求的是人民群众所追求的包括了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在内的整体利益。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党和政府就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将人民群众置于心中最高位置，坚持秉承群众利益无小事，深入调研和把握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利益所在，在实践中为人民群众诚心诚意办好实事、尽心竭力解决难事、坚持不懈做些好事，以加大反腐力度捍卫人民群众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体现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为民、造福于民的宗旨，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能达到得民心、顺民意、聚民力的重大成效。

二、正视因社情民意渠道不畅而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突出问题

社情民意渠道不畅必然使政党和政府的意志与民众的意愿无法正确对接和顺利进行双向沟通，从而严重影响意识形态安全。调查显示，政党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对话渠道不够畅通，文化价值观失衡、信息反馈不及时、办事遭遇推诿塞责、网络信息平台形同虚设，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加以改进之处。只有以问题为导向，找出社情民意渠道不通之处并着力解决，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重大民心工程来抓，才能有效地发挥社情民意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积极作用。

封建官本位文化价值观作为一种支配一些领导干部头脑进而影响其执政和行政行为的错误落后的意识形态，是阻塞社情民意渠道从而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观念性障碍。思想意识决定行为。畅通社情民意渠道，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牢牢地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主体性功能，必须理直气壮地反对和清除封建官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封建官本位文化价值观以官为本，是对以民为本的反动，制造了官与民之间的对立以及官大与官小之间地位的差异，是一种将是否为官和官的大小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人与人之间尊卑高下的极其落后错误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贯穿于封建社会始终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封建官本位的意识形态是助长腐败的重要思想根源，也是使权力失去监督制约的思想认识根源，是形成腐败的重要根源，与唯物史观倡导的人民主体性和共产党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格格不入。邓小平关于党与人民关系的“工具论”，即党不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工具，相反，人民将党当作完成历史任务的工具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封建官本位的意识形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邓小平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②

只有始终坚持党来自人民，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的理念，才能主动地畅通社情民意，自觉地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

人民主体性的意识形态为指导,竭尽全力地为人民群众谋取福利。而由于封建官本位的意识形态作祟,党政部门及工作人员就不可能铭记并践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可能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到至上地位,不可能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不可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不可能自觉地以人民群众为师,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细心体察人民群众的情绪和心声,耐心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困难,不可能真正改变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封建官本位文化价值观作为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大敌,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敌,严重地压制着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消解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党民之间在政治认同基础上形成政治共识,阻碍着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削弱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行政能力,严重地阻碍着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对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挑战。因此,意识形态安全除了要主动应对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的威胁、西方国家文化霸权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的威胁、西方国家输出所谓民主等普世价值对中国政治思想构成的威胁、宗教渗透对中国社会主义信仰认同构成的威胁外,还应着力应对和努力消解封建官本位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意识形态的威胁。按照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内因而不在外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将消除封建官本位的意识形态作为新时期头等重大的意识形态工作来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的宗旨这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就难以形成和发展。

不健全的信息沟通机制是导致社情民意渠道阻塞从而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体制机制障碍。信息公开透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和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及主要标志,政治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治公开透明。政治神秘化、寡头化和黑箱运作,有意或无意地拒斥人民群众应有的知情权与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以及决策权等各项合法权益的行为,离现代民主政治特别是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相距甚远,也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隐患。只有使党和政府及时了解掌握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求、困难和抱怨,同时使人民群众及时了解掌握党和政府的意图和方针、构想和决策,才能促进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科学化、大众化、开放化、透明化。为此,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府民之间的信息双向互动互馈机制,这对于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府民和干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已经有比较完备的人大制度、政协制度、信访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等制度,也有社情民意收集机制、报送反馈机制、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制度、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等制度,在信息沟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促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群众代表牢固树立“代表意识”,切实改变只“代”不“表”——不能表达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心愿,只是一个“哑巴代表”,或只“表”不“代”——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只表达自身利益或小部分人利益的现象,还有许多改革创新的任务要完成。要促进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代表意识,建立与人民群众的定期联系、交流、沟通制度,深入基层和实际,搜集和把握社情民意,从而形成来自实际和充分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的议案和意见、建议。长期以来党政部门在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形态影响下,习惯于对社会实行从上而下的管制,不习惯双向沟通交流以及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其结果,在党民之间和府民之间难以形成信息双向交流、双向增量的通道,得到全民认同和形成价值共识的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牢牢地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执政党和政府容易面临合法性危机、认同性危机、参与性危机、整合性危机以及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执政党和政府必须主动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社会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任务,加强电子党务和电子政务建设,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快速便捷地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并在此过程中及时反馈调整。因为社情民意渠道不畅通而影响意识形态安全,还与责任追究制度缺失和得不到严格执行有关。拥有公权力的执政党和

政府,要有相应的明确责任与其相对应,如果权力与责任界定不明确,公权力很有可能超越界限,不能得到有效约束和规范,并且还有可能出现部门相互推诿塞责的情况。这样,不但人民群众的事情解决不了,党委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也得不到追究。要将构建社情民意渠道畅通机制以及意识形态安全责任追究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保障和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以及其他各项合法权益。

不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导致社情民意渠道阻塞从而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障碍。毛泽东高度重视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将其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他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能获得第一手资料,能把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民生问题、党的执政和政府行政问题实实在在地亮出来。社情民意透露出来的大量信息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人民群众是社情民意的基础。因此,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切实地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汇集社情民意,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是密切联系群众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环节,有助于集中民智、增进共识,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人文化和法治化水平,有助于执政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双向沟通的渠道更加宽广和更加畅通无阻。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和政府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决策民主化和法治化、科学化和人文化水平直接关联人民群众各项利益的实现程度。决策的过程实质上是坚持群众路线的过程,要在决策中真正体现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主体作用,就要广泛吸纳社情民意,将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当作决策的重要依据和价值导向。否则,决策就将人民群众排斥在外,决策成为少数人说了算或一个人说了算,必然会导致决策违背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后果,决策失误就难免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畅通社情民意的好做法,然而,这几年调查研究的风气却在减弱,有些调查研究演变为专做表面文章的花瓶和点缀。“他们有的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基层调研只是走形式做样子;有的为调研而调研,在对象选择上就近避远、就富避穷、就优避差。”^①

许多官员由于淡漠了党的宗旨意识,长期脱离群众,形成了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养尊处优的享乐主义,个人专断的主观主义,甚至滥用职权和大搞特权,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被人民群众称为“悬浮干部”。由于不能听到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不能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和各种利益要求,也就无法将社情民意作为做好工作的重要依据,导致社会上因官民对立的仇官情绪和仇官现象大量滋生。只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才能破解阻塞社情民意渠道从而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性障碍。注重社情民意和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其目的是增进民生幸福。民生幸福与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紧密相连。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民心民意为基础,构建起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的保障系统,才能以社情民意渠道的高度畅通锻铸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铜墙铁壁。

社会稳定不是取消矛盾和不允许展开意见争论的静态而僵死的稳定,而是在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意见争鸣中逐渐寻找价值共识的动态稳定。如果没有大度的胸襟对待哪怕意见十分尖锐的社情民意,就会害怕舆论和压制不同的声音,最终必然引起处于潜伏状态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影响社会和谐。而注重在矛盾和意见交锋中得到思想认识趋同的动态稳定,是一种将社情民意当作减压器的稳定,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满自信的表现,让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使矛盾能够及时地表现出来并得到有效解决,这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更好地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保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实践证明,只有畅通社情民意渠道,广开言路,使人民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乃至牢骚和怨愤能得到及时宣泄,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从而将人民主

^①转引自:《调研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人民日报》2013年7月26日。

体性落到实处,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在规避社会矛盾激化中推进社会和谐稳定,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三、夯实畅通社情民意渠道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根基

畅通社情民意渠道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是新时期事关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除了要从执政理念和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破解一系列突出问题外,还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运用多管齐下和同时发力的整体性思维,夯实畅通社情民意渠道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实根基。

首先,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大力倡导、培植和弘扬人民主体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清除封建官本位的意识形态,促进社会意识形态始终行进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层建筑的轨道上。执政党、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只有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这些宪法明确规定的理念作为必须信守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自觉地摆正位置,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促进服务型执政党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夯实社情民意渠道畅通和意识形态安全的精神文化根基。意识形态工作和意识形态安全是与权力观和利益观紧密相连的。就权力观而言,权力观端正了,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就明确了、端正了。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本身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都得用于为人民服务,而不可用来谋求特权,搞权钱交易。要坚守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的信念,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幸福当作权力行使的根本准则。人民群众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情感互动和能量交换的关系,如同马克思所说:“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①

各级手握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的领导干部必须明确,只有把人民群众时刻放在心上,人民群众才能让你始终坐在台上。只有把人民群众当作亲人,人民群众也才能把你当作亲人。各级干部都要做一个有心的人,用心了解社情民意和意识形态动向;做一个心重的人,把群众的事情和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看得比泰山还重;做一个心诚的人,端正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诚心诚意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困难,为人民群众服务好,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和问计于民。社情民意的渠道畅通无阻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就会产生信赖和拥护,就会化解和消除不满情绪,而不断增加满意感、幸福感和信任感,党群关系、府民关系和干群关系就会不断改善,社会就会和谐稳定,就能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就利益观而言,只有牢固地确立唯物史观的利益观,才能把握决定社情民意和意识形态的关键因素,在对待社情民意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中就会自觉地运用利益分析法,从利益协调的高度通过一步一步地逐渐理顺利益关系,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求得在利益基本一致基础上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共识。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观点,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必然升华物,是人们对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物质生活过程的观念反射和回声。只有切实地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将事关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交通问题、养老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作为重大的实际问题来抓,认真解决好,切切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47—248页。

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等各种权益,才能使人民群众自觉地信守和践行执政党倡导的意识形态,从而使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根本不成其为问题。

其次,要通过以信息公开透明运作为内容的政治文明建设,加强党和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民情民意调查制度、信访工作制度、意识形态安全责任追究制度等建设,以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成效奠定坚实的畅通社情民意渠道和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制度根基。意识形态的可信度和话语权并不来自权威以及信息传播的频度和力度,而来自信息公开透明的真实性,来自执政党和政府对社情民意的重视程度和吸纳程度。要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广度和深度,畅通政府的社情民意通道,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知情权,并在政府与人民群众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总结归纳社情民意,分析和研判意识形态动向,抵制错误落后的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导那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向健康方向发展,为政府决策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撑和民意支持,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人文化。要加强社情民意调查和意识形态安全分析研判制度化建设,明确社情民意调查和研判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地位,研制和分析工作规范与调查结果以及分析研判的效力等,要对社情民意调查和意识形态动向予以分类研究,确定各类调查结果和意识形态状况进入决策的层级和流程,使社情民意调查工作和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真正做到有章可循和有据可依,确保意识形态工作在制度框架和法治基础上规范有序地运作。要客观、科学和公正地发布社情民意调查结果和意识形态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对主流民意和社会意识形态动向具有知情权和表达权。信访工作是密切联系群众和倾听群众呼声的重要工作,是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矛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为民排忧解难以及及时地把握意识形态动向的重要渠道。信访工作起着了解社情民意并在此基础上正确研判意识形态安全状况的“晴雨表”的作用,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和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安全阀”的功能。要努力改进工作作风,满怀情感对待上访群众,自觉地转变立足点,站在对象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真正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认真落实便民利民措施,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热情服务,确保件件有明确答复。要重视初信初访,加强基层信访工作能力建设,通过主动下基层接访,把许多信访问题及时地解决在基层。这样,“如果将信访制度汲取的底层民意导向政治和政策层面,则信访制度将会成为现行政治参与制度之外非常且有益的补充”^①。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制建设,明确责任范围,强化意识形态责任追究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明确负责社情民意通道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如果本该履行的职责和服务没有到位,必须严格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再次,要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切实改进调查研究方法,把握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实际问题和真实的思想动向,通过社情民意掌握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机,从而正确地研判意识形态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着力夯实社情民意渠道畅通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根基。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新的急剧变化,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常态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特殊阶段,在应对社情民意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中出现了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现象。只有大力改进工作作风,将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和成事之道,才能牢牢地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发言权、话语权、决策权和主动权。当前在对社情民意影响意识形态工作和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点问题很多,把握这些重点问题,有助于从探索和遵循规律中积极回应社情民意和着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以及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以及社情民意动向对意识形态工作和意识形态安全究竟提出了哪些新课题?执

^①张海波、童星等:《网络信访:概念辨析、实践演进与治理创新》,《行政论坛》2016年第2期。

政理念以及执政方略如何根据社情民意的现状和发展变化做到与时俱进?在利益差异化和多样化以及社会阶层结构深刻变化的格局下意识形态工作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哪些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将党性与人民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如何正确地引导多元社会意识形态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靠拢并能最终形成一元与多元并行不悖以及相互融合格局?鉴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归根究底是民心客观反映的事实,如何科学制定出得民心、察民情、顺民意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上集思广益,使决策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如何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网络等大众媒体合理有效地宣泄和疏导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怨愤?如何把正确导向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思想工作各个领域,促进全社会唱响主旋律和传播正能量?如何更好地促进意识形态接地气,将社情民意作为题材,宣传好先进典型,讴歌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以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凝聚改革共识,不断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如何精心打造好网络空间这个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通过网络了解社情民意,积极回应网民关切,通过网络走好群众路线?如何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着力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和主动权?如何促进各级领导创新群众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切实担负起责任,把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作为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执行党的纪律的监督检查的内容,作为干部业绩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应答好这些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如同习近平同志在湖北调研时指出的,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责任编辑:杨嵘均)

Ideological Security: Its Relation with Smooth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Opinion

FANG Shi-nan

Abstract: Public opinion,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social ideolog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deological security: a smooth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s the key to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The problems with the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opin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serious consider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trong sense of initiative and responsibility is needed in dealing with the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al values caused by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inadequate and inappropriate governance. Multipl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mooth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opinion, to reach the consensus on values (i.e. the biggest social common divisor) through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to achieve political progress through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ublic opinion; ideological security; political progress